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Zhongguo Chubanjia
Xu Boxin

中国出版家
徐伯昕

柳斌杰 主编 张文彦 著



人民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出版家丛书
ZHONGGUO CHUBANJIA CONGSHU



柳斌杰 主编 张文彦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任 益
封面设计:肖 辉 孙文君
版式设计:汪 莹
责任校对:白 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出版家·徐伯昕/张文彦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3

(中国出版家丛书/柳斌杰主编)

ISBN 978-7-01-017712-0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徐伯昕(1905~1984) —生平事迹 IV. ①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0854号

中国出版家·徐伯昕

ZHONGGUO CHUBANJIA XU BOXIN

张文彦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22.25 插页:8

字数:280千字

ISBN 978-7-01-017712-0 定价:70.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 65250042

出版说明

出版不仅仅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商业领域，同时，它也深深打上了“文化”和“思想”的印记。在这个文化场域中，交织着多种力量的动态关系，通过出版物的呈现和出版活动的开展，描绘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貌；而回旋折冲于其间者，则是那些幕后活跃、台前无闻的各类出版人。他们自喻“为他人做嫁衣裳”，事实上，却是国家文化传承和历史记录的主要担当者，有出版发展的参与人和见证者甚至称他们所起的作用为保存民族记忆的千秋大脑。虽然扼据出版要津之地，却少见自家行当的人物传记出版。本丛书是第一次规模化地为这个群体中的杰出者系列立传，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的出版事功中，折射出近代以降出版业的俯仰变迁，同时也见证着出版参与时代文化思想缔构及其背后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那些曾经彪炳于时的出版人，一方面安身于这个行业，以其敏锐犀利的时代洞察，在市场、经营与创意中躬行实践，标领乃至规划了这个行业的发展，并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门类；另一方面又在“安身”之外，显现出面向社会的公共性关怀与“立命”的超越性关怀，从职业而志业的追求中，服务于民

族解放、思想启蒙与文化进步的社会性经营，书写了出版人生的风采、风骨与风流。

本丛书所传写的 50 余位出版人，均为活跃于 20 世纪并已过世的出版前辈。中国古代也曾涌现了陈起、毛晋等出版大家，只是未纳入本书的传主范围。丛书在体例上，有单人独传与多人合传之分，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对传主出版贡献及其历史地位的轻重判别，许多情况下的数人合传，乃困于传主史料的阙如而不得已的选择，某些重要出版人如大东书局总经理沈骏声、儿童书局创办人张一渠等，也囿于同样情形而未能列入本丛书的传主名单，殊觉憾事。虽说隐身不等于泯灭，但这个行业固有的幕后特征多少带来了出版人身份上的隐而不显、显而不彰。本丛书的出版，固然是想通过对前辈出版事迹的阐幽发微、立传入史，能让同样为人做嫁衣者的当今出版人不至于觉得气类太孤，内心获得温暖，并昭示后来者在人生目标上，在家国情怀上，在出版境界上，追步于前贤，自觉立起一面促人警醒自鉴的镜子；同时更希望通过一个个传主微历史的场景呈现，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出版在产业之外，更是一项薪火相传的社会文化事业，它对时代文化的接引与外度，使其成为一种任何人都不可忽视的“势力”，在百余年来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故此，我们推出这套“中国出版家丛书”，以展示中国文化创造者的风采，弘扬他们的优良传统和崇高的职业精神，发掘出版史史料，丰富出版史研究和编辑史研究。

“中国出版家丛书”编辑委员会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六年四月

前 言

徐伯昕（1905年—1984年），江苏省武进县人，名亮，字伯昕，年轻时在《生活》周刊上发表漫画、插图时曾用笔名吟秋、B.H.、白日、PS。后来，在韬奋去世前后，徐伯昕在上海从事革命出版事业，曾化名徐味冰、赵锡庆。

长久以来，“邹韬奋”这个名字，一直都是我国新闻出版史上光华灿烂、叱咤风云的存在，他与生活书店乃至中国当代出版精神紧密地联结在了一起。徐伯昕，作为邹韬奋一生出版事业不可或缺的“搭档”，生活书店的共同缔造者，其社会声名却并未远扬。直到近年来，报刊上才有一些专门论述其为人行事的文章，比如研究民国出版史的吴永贵先生曾两度在《光明日报》上撰文，论述徐伯昕的出版贡献，以及与韬奋的事业合作关系。^①也有一些文章，称徐伯昕为生活书店

^① 两篇文章分别是，吴永贵：《徐伯昕：邹韬奋的黄金搭档出版事业楷模》，《光明日报》，2012年07月30日；吴永贵：《徐伯昕，同样是出版事业楷模》，《光明日报》，2006年11月29日。

的“总管”，论述他在经营管理上的运筹帷幄与生活中不善交际的邹韬奋正好互补，但又称伯昕是韬奋身边的“隐形人”。^①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出版业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尤其在当时的出版重镇上海，无数文化精英投身出版，涌现出诸多各有专长和建树的出版家。比如邹韬奋，他在校读书期间，就已经发表了不少文章，加盟中华职教社之后，更是名声迭起，许多年轻人都已仰慕韬奋先生的思想和为人。1925年10月，32岁的邹韬奋接任《生活》周刊主编一职，年仅22岁的徐伯昕已经在此工作了一整年。

徐伯昕没有出众的家室和学历，耕读农家，毕业于中华职教社开办的中华职业学校珐琅科，此前他爱好美术、画画，在《生活》周刊负责出版、发行、广告及总务工作。邹韬奋的到来，也可以说是徐伯昕的出版事业迅速腾飞的起点。

徐伯昕一生的出版事业，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生活》周刊时期，1925年到1933年，这个阶段，徐伯昕展现出惊人的经营天赋，他在发行和广告工作中的策略和热忱，让邹韬奋编辑家和新闻家的光芒如虎添翼，仅用一年的时间，《生活》周刊的发行量就突破2万份，后来增至4万份，1931年特刊高达15.5万份。《生活》周刊的文章，虽然少有能够传颂千古的名篇，但对于当时政治、社会巨变中的中国，却是极其“解渴”的“有用”文章，读者遍及政、商、工、学各界，是一份真正的大众刊物，但如若没有徐伯昕那张迅速蔓延的发行网，大众又是无法“识得春风面”的。当时怀揣着办报出书梦想、从事出版业的文人学者如过江之鲤，但许多书报社都因为

^① 徐百柯：《徐伯昕：与邹韬奋互补》，《中国青年报》，2004年11月10日。

经营困难，旋生旋灭。恰恰是徐伯昕的这张发行网，为《生活》周刊带来了众多忠实读者，这些读者不仅积极向读者信箱投稿，也会热心襄助周刊的广告经营、社会公益活动，这与当时同人办报、知识分子之间在报刊上的应和辩论大大不一样，而是更具有大众化互动媒体的意味。

第二个阶段是生活书店阶段，1933年到1942年，这是徐伯昕出版事业的黄金时期，也是生活书店由全盛到受难于日军侵华战争的时期。1933年，邹韬奋因言论得罪国民党当局，为躲避特务暗杀出国流亡，徐伯昕第一次独自扛起《生活》周刊重任，并随即注册成立生活书店。这个时期，徐伯昕跟文化界和出版界的人事往来前所未有地密集起来，他和胡愈之、艾寒松、毕云程等商量创办新刊《新生》，努力向作家文豪约稿，宴请鲁迅、茅盾、黎烈文，登门约稿，一年的时间里，成就了不少大事，但因劳累过度得了肺病，即便咯血，也撑着病体操持店务，为遭到查封的《新生》善后。直到韬奋1935年回国才“押”到莫干山养病。在当年，肺病和牢狱、战火之灾一样，是危害生活书店职工生命的可怕杀手之一。徐伯昕闯过了这一劫，在面对随后的“七君子”事件、抗日战争爆发的无数难关中，开始日益展现出一种愈是危难、愈是运筹帷幄气定神闲的将领风范——徐伯昕所面对的，不仅是文化的战场，更是真正的战争。

1937年之后，徐伯昕从悉心筹划第二个分店广州分店开始，在战事危急的前三年中，生活书店分店的建设铺展全国，多达56家，工作人员达到四、五百人。在翻阅各种史料尤其是近百期《店务通讯》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这些分店的建立，是在炮击、空袭、毒气、时疫肆虐、国民党查禁的前沿中浴火成立，这些书店往往在炸弹来袭、

沦陷的前一刻还在营业，商务印书馆、中正书局门可罗雀，生活书店却人头攒动。在面临着财政危机、管理难题、审查压制、运输困顿、造货困难、战友牺牲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危难时，徐伯昕不断推动着生活书店的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民主化，他将韬奋的管理思想落到实处，形成制度。在理事会的民主选举中，徐伯昕获得了最高票，在分店同事们的信件中，可以读得出职工们对“徐先生”的信赖、亲近和仰慕。他肩负着生活书店最难做的职务，却总是报以“微笑”。

如果说邹韬奋是徐伯昕毕生追随的精神导师的话，在重庆，徐伯昕遇到了他的另一位精神导师，这影响了他后半生的出版事业——周恩来。虽然徐伯昕在上海时就已开始为革命出版事业付诸了行动，但在重庆与周恩来的多次会面，则让他对共产党的向往更加明确和强烈了。1941年，生活书店遭到国民全面封禁。1942年，徐伯昕向周恩来表达了加入共产党和去苏北解放区工作的意愿。

第三个阶段是革命出版阶段，1943年到1954年。1943年，邹韬奋罹患重病，徐伯昕急赴上海，陪伴了韬奋人生的最后一程，并将他的遗嘱带往苏北，在这里，遭遇了生死离别的徐伯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再次返回上海，化名展开了地下革命出版工作。从一家周刊社，到五十多家书店，再到一家小书店，徐伯昕这次的回归有了质的巨变，他通过书店，接济了进步作家的生活，通过出版工作，团结着民主人士。1947年又回到香港，作为主要领导人之一，筹备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成立工作。不久，新的出版事业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建国后，徐伯昕在生活书店多年所选拔、培养的出版人才，成为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中间力量，他本人却因多年的紧张工作，一身病痛，在负责出版管理部门的几年工作后，1955年，徐

伯昕离开了出版事业，开始专门从事统战工作。这次工作的变化，是周恩来的识人之明、亲自安排，但对于徐伯昕来说，是不舍的，但他是一个不轻易表达感情的人。这种不舍，这种对生活书店和邹韬奋的难以挂怀，在他晚年的一系列努力中彰显无遗。

第四阶段是重新点燃韬奋精神的火炬的阶段，1979年到1984年。1955年之后，徐伯昕虽然在统战工作中仍然心系出版事业，有着各种推动出版、读书方面的努力，但毕竟政务繁忙，笔者可以发掘的事迹很少。“文革”结束后，在人生最后的几年里，徐伯昕为曾经的出版事业，也可以说为了我国的出版事业，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是在再次点燃韬奋精神的火炬。1979年，在韬奋逝世35周年之际，徐伯昕专门撰长文纪念，追忆了韬奋一生的出版事业，以此批判“文化大革命”时期邹韬奋被诬陷为三十年代出版界的“黑线人物”、生活书店是“三十年代黑店”的说法。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引用了韬奋的遗言，这份遗言，是1944年韬奋去世之前亲口所述，徐伯昕亲笔记录的，这么多年来，他一直珍藏在身边。1984年徐伯昕去世前所留下的数行手迹，似乎是在回应半个世纪前邹韬奋所留下的遗言，又像是邹韬奋遗言的一首副歌。

第二件事，是为恢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建制所付出的努力。在三联书店五十周年之际，徐伯昕发表了长文《为艰苦斗争中建立的团结》，他联络三联书店的老同志们共同向中央致信，要求确定建国前在三联工作过的老同志们的革命工龄，后来又联合致信中宣部、文化部，请求恢复三联书店的建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能够在中断多年后再次重建，并成为中国出版业的娇子，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离不开徐伯昕毕生的努力和遗愿。

徐伯昕与邹韬奋，是他们共同缔造的出版事业缺一不可的“心”与“脑”，“生活”出版系列的巨大影响力，是两位先生所共同创造的独特奇迹。他们不但在事业上互补，在性格上也交相辉映，历史所留下的关于韬奋先生的记录，洋洋洒洒，常常可见大笑，大哭，怒骂，涌泪，痛快淋漓，是名士真风采；而对于伯昕的记录，却惜墨如金，寥寥数次的表情描写，都可归结为一个“笑”字：他向茅盾约稿，茅盾误会了，他是“笑”着解释；和国民党的书报审查官据理力争之后，脸上也是带着微笑；在上海从事地下出版工作，资金严重短缺，他也是“笑嘻嘻”地答允去想办法。在同事们的追忆里，徐伯昕先生总是和颜悦色，亲切友善，对待工作，他一贯缜密之至。徐伯昕先生所留下的文字，是非常的平实而内敛的，其中大部分是为了安排具体出版、发行、印刷、财务、管理工作而写。因此，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笔者常常在史料中感受到一种不常见的感动——为徐先生的执事、处世的态度和方法所深深打动。

在徐伯昕的出版经历中，我能够看到革命对于一个职业出版家的逐步启蒙和转化，看到了这位出版家的实践活动中现代性和革命性互相交汇、互为促进，看到了革命出版事业中所凸显的技术和经营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如同一座平地而起的大厦，其巍峨，其致密，不仅需要思想家和理论家的宏观构建，更需要徐伯昕这样的实干家的营造。由此，研究徐伯昕的出版事业有着多个层面的意义和价值，这些是笔者未能充分挖掘的，有待时日，有待志同道合的研究者。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青春放歌：从练习生到生活书店	001
一、水乡少年	002
二、热爱美术的珐琅专业委培生	008
三、大上海的练习生	015
四、中华职业教育社与《生活》周刊的管家	018
第二章 广告天才：《生活》周刊的岁月	021
一、“两个半人”团队中的成长	022
二、过街小楼的深夜灯光	025
三、营建最初的经营发行网络	029
四、漫画、插图的创作	034
五、天才广告家的成长	037
六、徐伯昕的广告理念	044

七、突破上海报刊发行的最高纪录	053
八、从职员到经理的蜕变	063
九、九一八事变后的思想转折	066
 第三章 呕心沥血：为生活书店的奠基奋斗	075
一、突破发行的封锁	077
二、创建生活书店	080
三、营建生活书店的出版网络	086
四、《文学》周刊的较量	090
五、《新生》事件后心力交瘁	095
六、缺席所引发的《译文》风波	102
七、为生活建造期刊方阵	113
八、为生活书店建章立制，奠定根基	121
 第四章 文化救国：抗战中扩张出版网络	127
一、病中部署	127
二、险渡“七君子事件”	130
三、徐伯昕的期刊方阵	135
四、以刊带书，铸造本版书系	140
五、精心营建发行、融资战略	142
六、与中共中央建立紧密联系	152
七、在武汉布局全国发行网络	158
八、痛折汉粤两店，转战重庆布局新“战场”	167
九、接受党的领导，推动生活书店改革	172

十、继续践行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出版理念	189
第五章 万水千山：出版战场的重重突围	193
一、与书报检查政策周旋	194
二、内外交困，野火春风	201
三、为生活书店的命运而争	212
四、在香港的短暂发展	215
五、余烬中再燃希望， 按周恩来指示建立出版三条战线	220
六、痛失韬奋	227
七、民族危亡中的未竟蓝图	231
第六章 红色岁月：接续韬奋的出版事业	235
一、在上海的地下出版活动	236
二、复建生活书店，为三联奠基	238
三、再返香港始创三联	252
四、三店联合后的管理工作	255
五、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出版工作	260
第七章 情牵出版：以身传承生活精神	265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出版工作	267
二、“文化大革命”到来	271
三、缅怀周总理	274
四、力驳“三十年代黑店”	278

五、徐伯昕的“韬奋精神”	286
六、为三联燃最后的心香	293
第八章 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	305
一、伯昕与韬奋——生活的“智慧”与“精神”	305
二、徐伯昕的出版道路选择	310
三、理想在先还是利润在先 ——徐伯昕与民国出版经营家们的比照	313
四、从出版到统战——对徐伯昕事业转折的探讨	318
徐伯昕编辑出版大事年表	320
参考文献	336
后 记	341

青春放歌：从练习生到生活书店

近代以来，尤其是戊戌变法之后，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邹韬奋等大批知识分子本着启蒙民智、文化强国的夙愿陆续投身到出版事业中来，成为中国现代出版业崛起之栋梁，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化转型与发展之栋梁。这些出版大家的人生、事迹、出版思想被后人一论再论。相较而言，本书所要重点论述的人物——徐伯昕，却显得相对沉寂，这或许与他一直致力于出版经营管理事业，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即离开了出版行业有一定关系。尽管有相关的纪念文集问世，但一直缺乏从出版角度进行深入、系统的挖掘和解读。直到近年来，才有《徐伯昕：邹韬奋的黄金搭档 出版事业楷模》（吴永贵，《光明日报》2012年7月30日）

等观点鲜明的文章问世，引起出版研究领域的再度关注。正如吴永贵先生在文中所言：“出版业的发展，既需要有像邹韬奋这样的编辑大家，也需要有像徐伯昕这样的经营专家。两种类型出版人的并肩携手，方能结出‘事业性和商业性统一’的璀璨文化之果。”相较商务、中华这样的大社，三联书店的成长发展史，更多的是在内外战乱的夹缝与重重风险中艰难求生，逐渐壮大。其生存发展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作为单纯企业的经营管理才干、编辑出版技能，还需要经营者有革命家的胆识与谋略，才不至于在政治与经济的压力下早夭。由此而言，徐伯昕的出版方略的确值得深入研究。

一、水乡少年

光绪三十一年（1905），晚清政府已近穷途末路，而古老的中国仍然在风雨中前行。这一年，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铅字版的《天演论》，为百年“汉译世界名著”奠下第一块基石，中国现代出版家的张元济等人，由此率先踏上了中国出版的新征途。这一年的3月4日，江苏武进县鸣凰乡小留塘里村（今属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里，徐家次子出世，取名为亮，字伯昕，小名“明圣”。

武进在上海西北一百八十余公里，属于苏南地区，“北环长江，南襟太湖，阡陌交错，尚称肥沃之区，人烟稠密，鸡犬之声相闻”。这里河网密布，乡间竹篱环绕瓦屋茅舍，居民们大多衣履青黑色自织